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种爱国观

——写在义和团运动90周年之际

周 源

今年是鸦片战争150周年，又是义和团运动90周年。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存在着历史的内在联系。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凌辱中华民族的开端。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把侵略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逼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向中国人民勒索数额惊人的战争赔款，强占中国的大片国土，攫取各种侵略特权。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升级，中华民族的苦难日益严重。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年，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阴云笼罩着神州大地。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近80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蒙受苦难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在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抗英斗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反帝爱国斗争的帷幕。由此发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及至19、20世纪之交，在中华民族十分危机的时刻，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狂飙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骤然兴起，其规模声势之浩大，波及范围之广，超过了前此任何一次反帝爱国斗争，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失败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新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史学界经久研究的课题。目前，国内史学界普遍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这次运动有着严重的保守性、落后性，最突出地表现为它的盲目排外，或曰笼统排外。这就引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盲目排外是不是近8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帝爱国斗争的固有特征？显然不是。就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不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又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无疑，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都不曾带有盲目排外的色彩。恰恰相反，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参加者都不讳言向西方学习，以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用以改造贫穷落后的中国为职志。同一历史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对待外来事物上，却有着如此鲜明的差异，是耐人寻味的。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实际存在着两种走向或趋势，差异之处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是排斥，还是学习。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的阶

级、阶层的人们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爱国观，即传统爱国观和近代爱国观，下面就管见所及，草成此文，就教于史学界师友。

一、近代爱国观的形成

今天，我们经常称引的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源出列宁，即“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从广义讲，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具有的一种朴素、可贵的基本思想感情，表现为人民对于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发自内心的、深切真挚的爱恋，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习俗、亲人，以至祖国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这种感情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孕育、生长、成熟，潜移默化地扎根于人们心灵的深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成份……，但对祖国的热爱却是共同的。爱国情感最能引起人们感情的共鸣，成为沟通人们心灵的纽带。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世代代生息繁衍在神州大地上，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独领风骚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感情因其源远流长，更为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爱国主义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产生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爱国主义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②

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历史阶段。鸦片战争前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其具体内容，总的来说，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对外方面：在遭受黑族或异国的侵略和压迫时，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二、对内方面：反对本国的黑暗政治，解除或减轻人民群众的苦难；或者在增进民族团结、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做出贡献，从而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于本国人民。从广义讲，凡在上述两个方面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的人，都可称之为爱国者。但是，受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这同样也表现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皇帝以上天之子的身分君临天下，大权独揽，成为国家的化身。人们总是把爱国与忠君思想混在一起。因此，忠于国家和忠于皇帝难于区分。对外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亿万农民群众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缺乏与外界往来、交流的要求。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相应地表现为缺乏向其他国家学习，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自觉性。加之，古代的中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前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力强大，文明昌盛；周边各国和民族只能望其项背，纳贡臣附，形成藩属关系。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为自己的祖国充满自豪感的同时，又失之于自得其大，把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各民族鄙视为野蛮的、不开化的“夷蛮”。19世纪初，世界早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清王朝封建统治者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傲视天下，以“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沾沾自得。千百年形成并不断强固的“华夷之辨”观念，不仅深深扎根于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中，而且也是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的普遍心态。

“华夷之辨”观念不能正确对待外部世界，妄自尊大，因循守旧，导致闭关锁国，阻碍社会的进步。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其危害日益严重。

历史是无情的。在清王朝的朝野君民浑然不觉中，以英国为首的一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并把侵略的触角向东方。这些高鼻凹眼的“夷人”仿佛从天而降，凶恶地扑向古老的中国。清朝君民不得不面对这样陌生而强悍的敌人。

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最突出、最尖锐的矛盾。中国人民开始从抗击生产力水平低于自己，甚至社会发展阶段也低于自己的周边各国和民族的侵略，转变为反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自己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这个任务是异常艰巨的。长期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未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经济技术水平远远落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在近代世界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之所以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因此，在近代中国，欲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避免殖民地化的恶运，就必须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文化。就当时的国内条件、国际环境而言，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就必须向西方资本国家学习，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既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的民族敌人——的先进事物，这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中国近代爱国观的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传统爱国观中“华夷之辨”，“夷夏之大防”之类千百年来唱烂了的陈腐教条，只能使国家因循守旧，虚骄自大，不思进取改革，只能使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日甚一日，到头来只能成为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对象。是否肯于向西方学习，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的近代化，是近代爱国观与传统爱国观的根本区别。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和影响，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和新的思想文化（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社会环境的这一深刻变化，为近代爱国的仁人志士们既继承古代爱国主义中反抗外来压迫的斗争精神，又突破其“华夷之辨”的陈腐观念，形成合乎时代要求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爱国观提供了现实的、必要的历史条件。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在广州领导禁烟抗英斗争的同时，十分注意探察外情，组织人翻译西文报刊，编辑《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林则徐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是鸦片战争中的抵抗派，战争失败后，他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赶写了《海国图志》，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林则徐、魏源思想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率先破除了“华夷之辨”的虚骄痼习，大胆地承认中国确有不如“夷人”之处，并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起了开风气之先的进步作用，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近代爱国观的萌芽。

遗憾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不仅未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在封建士大夫中也没有什么反响。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君臣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亡羊补牢，改

弦更张，依旧昏昏噩噩，苟且偷安，坐失奋起直追的大好时机。十几年后，英、法两国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仓皇北窜，京师沦陷，清政府遭受了更为惨重的失败。痛定思痛，统治阶级上层以奕訢、文祥、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之士，意识到用“敬天法祖”、“恪守祖训”那一套旧传统已无法应付新的形势，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技”，才能挽救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开始倡导和实施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大机器生产为中心的“求强”、“求富”活动，史称“洋务运动”，这部分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编练了新式海陆军，举办了一些西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材。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和领导的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带有明显的对外御侮的性质。洋务派官员中也不乏真诚的爱国者，他们顶着顽固派“以夷变夏”，“奉洋人为师”的攻击，诽谤，大胆向西方学习，在破除传统爱国观中保守、落后的观念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地主阶级改革派所从事的改革是极不深刻，极不彻底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仅限于学习、引进某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器物，依然保留传统的封建体制。洋务派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固然炮利船坚，机器精良，但是在制度，文化方面，还是不如中国，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藩篱。因此，洋务派的爱国观处于由传统爱国观向近代爱国观转变的中间状态，新旧杂陈，半旧半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爱国观。

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逐渐形成。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虽然弱小，但它是与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近代文明相联系的先进阶级，所以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爱国观的载体。

19世纪末，受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酝酿已久的改良主义思潮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发动了史称“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改革运动，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他们看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对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行全面的改革，锋芒所向，直指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主张仿效日本、俄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戊戌维新运动是在近代爱国观指导下的第一次政治实践。

20世纪初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堕落到“洋人的朝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且以较维新派更坚决、彻底的态度否定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事物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响起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全国各省区展开。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和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覆灭，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这是在近代爱国主义指导下人民斗争的结晶。

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近代爱国观之所以能从一根嫩芽长成茁壮的大树，并结出丰硕的果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观念适应中国近代社会的要求，较好地解决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向西方学习的关系。

二、义和团运动与传统爱国观

前边讲过，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和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文化，为新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近代爱国观的出现和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必要的历史条件。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后，尽管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面临着空前的、深刻的危机，等待它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但是，中国这样一个老大的封建帝国的瓦解、崩溃绝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强劲有力的。因此，传统的爱国观仍有着十分广阔的社会基础，并不因近代爱国观的出现和形成而被迅速替代，相反，它在近代中国曾长期支配着，禁锢着大多数人的头脑。

在近代中国，传统爱国观的承载者是与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农民阶级以及地主阶级中的爱国者，而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农民群众在传统爱国观指导下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帝斗争。因此，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近代爱国观的一次最强烈的暴光。剖析义和团运动，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爱国观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表现和作用。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在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义和团民发扬了中华民族不甘心于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主义传统，揭竿而起，奋起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一场民族自卫斗争。在斗争中，义和团表现出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骄狂的侵略者深感，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华民族“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人民“民气坚劲”，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不得不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企图，代之以扶持清政府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义和团运动的史实证明，既使在中国近代社会，传统的爱国观仍不失其团结、激励亿万农民群众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因为如此，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袭来的时候，平日默默无闻，胼手足耕种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群众，呼啸着杀向反侵略的战场，成为英勇不屈的民族卫士，演出了象义和团运动这样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义和团运动既反映出传统爱国观在近代社会条件下的积极一面，同时又将传统爱国观中消极的一面暴露的十分充分。农民是小生产者，分散、闭塞的生活环境，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蒙昧的文化水平，使他们不能形成科学形态的反帝思想。他们不可能区别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不可能区别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的资本主义事物，甚至不能把中国学习、引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事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区别开来。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民群众的反帝表现为盲目的排外，目的是恢复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被打乱、破坏了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那种平静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恢复鸦片战争前“闭关而治”，自成一统的局面。义和团运动时期，因中外民族矛盾激化，农民群众的民族激情异乎寻常地高涨，那种基于“华夷之辨”的妄自尊大的情绪，因受“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之类迷信神天的信念的刺激和煽惑而更其膨胀，此前一般的排外思想、排外行动，至

此发展为一次巨大的排外狂潮。义和团民在与侵略军作战，惩治为非作歹的不法传教士的同时，对一切“洋人”，不论教士、商人、外交人员、商人和其他侨民，甚至不分男女老幼，概行杀逐，还攻击受国际法保护的外国驻华使馆，有的甚至扬言，在三个月内将在华洋人“杀净”，然后“分队驰赴各国扫平巢穴，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③义和团民在打击混迹于教民之中的刁顽恶棍、地痞流氓的同时，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逐教民，使大量教民仅因其信仰基督教而横遭杀戮，迫使教民们成百上千，乃至上万人，以村寨或教堂为依托武装集结，与团民互相攻杀，到处是战场，处处闻杀声，能够投入反击八国联军侵略正面战场的团民为数反而不多。非但如此，举凡一切与资本主义事物有联系的东西，如“洋货”、“洋器”、“洋学”，一切与“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皆在义和团毁灭打杀之列，“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④“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⑤义和团揭贴声称，要“折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⑥“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皆“必杀无赦”。^⑦类似的记载，不一而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同盲目排外的喧嚣相交织，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与野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相缠绕。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的面貌。

前文提到，传统爱国观的承载者不仅有农民阶级，也包括地主阶级中的爱国者。具体到义和团运动而言，确有一批清政府官员支持义和团，为其撑腰、打气，甚至亲自统带义和团，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官员全是政治上的顽固派。于是不少论者称，这些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仅仅是“利用”义和团（大概是怕把顽固派与义和团捆在一起，会给这次反帝爱国运动“抹黑”），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封建顽固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通常把它作为洋务派的对立派别，以后又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一个对立面。

“政治上的极端反动和思想上的极端保守落后，维护一切黑暗势力，仇视和排斥任何进步的新生事物，愚昧落后，而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贫弱衰败，而又自我欣赏，夜郎自大。就成为顽固派的特征。”^⑧因此，从来没有人肯为顽固派说“好话”。但对内保守反改革，并不等于对外就卖国，正如办洋务搞改革，未必个个都是爱国者一样。这是两回事。就支持义和团运动的顽固派官员而言，情况就不大一样。载漪、刚毅之流是当时顽固派的主要代表，他们在扼杀了戊戌变法后，趾高气扬，继续倒行逆施，耸动慈禧废除光绪帝。他们的“已亥建储”遭到大多数国家驻京公使的反对后，排外情绪强烈，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权势欲，不顾国内外条件，把国家战和大事当儿戏，利用义和团向“洋人”撒气。及至八国联军大兵压境，他们既不亲临前线，又不筹措战守，只是躲在北京城内瞎折腾，折腾什么？一个是攻使馆，欲杀外国公使泄愤，再一个是企图搞政变，“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将包括光绪帝在内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全部清除，乱中夺权，建立清一色的顽固派政权，城破之日，他们没有殉国的勇气，仓皇逃窜。没有一丝一毫值得肯定之处，完全是“卖国”、“误国”。李秉衡则是另一类顽固派官员的代表。李秉衡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任山东巡抚，1895年11月2日，他曾上《奏陈管见折》，主张“不必侈言变法”，反对修铁路、设邮政局、开矿山和发行货币这样低层次的改革，至于设学堂兴西学，更认为是“离经叛道之谈”，^⑨

完全是顽固派的腔调。但他在反对外来干涉方面却态度坚决。1900年6月,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时,他在长江巡阅使任上,以七十高龄,不辞酷暑,星夜兼程率军北上勤王。到京后,侵略军已攻陷天津,兵逼北京,战局崩坏之势已成。李秉衡受命于危难之际,组织北京保卫战,然因节制各军纷纷溃逃,无力回天,他实践了自己“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的誓言,自杀殉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为国捐躯的高级官员之一。显然,我们不能因李秉衡政治上属于顽固派,而否认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李秉衡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地主阶级中一类人的代表,尽管他们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但他们同样真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为了保卫祖国,不惜同侵略者浴血奋战,以身殉国。遗憾的是,他们未能与时俱进,是拖着挣脱不了的封建思想的镣铐走上反侵略斗争的战场,这就使他们的英勇行为又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李秉衡这样的顽固派,从思想到行动,与义和团中的农民群众同声共气,谈不上什么“利用”和“被利用”,都是受传统爱国观指导的旧式爱国者,没有必要硬在他们之间划上一条什么线。不应该厚此薄彼。

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爱国观延伸至近代社会,仍长期起着动员、激励人们投入反帝斗争的巨大作用,出现过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演出了如义和团运动这样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由反对周边民族和异国的侵略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爱国观带有了些近代色彩,但这毕竟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传统爱国观的承载者们企图用古方治新病,自觉不自觉地要拉历史倒车,把国家拽到旧时代去,这反映出它严重的保守性、落后性,从而与近代爱国观严格地划清了界限。传统爱国观只能呼唤人们的爱国激情,发泄对侵略者的愤懑,却不能解决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反抗侵略这样严肃、深邃的历史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在进步,人民在觉悟,传统爱国观的影响和作用逐渐衰减。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反映出传统爱国观的影响和作用在近代中国达到了它的最高潮。最高潮即极点,从此该走下坡路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爱国观,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三、结束语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而这种斗争是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进行的。因此,“爱国主义”是我们在课堂上、报告中、文章里说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一个词语。但人们说得、写得最多,似乎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细究起来,常常又会有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内。比如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是少数卖国贼之外的中国人的共同精神支柱,但这些中国人又可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其爱国观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是太相径庭的。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本文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写作的。

本文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人们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爱国观,并就这两种爱国观同时存在的原因,它们各自的内容、作用等问题作了初步、粗浅的分析比较。问题还有待于展开,如既然近代爱国观较传统爱国观合乎时代要求,为什么其承载者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又比如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对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或很少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参与,两种爱国观何以如此不相容?时间和篇幅的关

(下转第20页)

- ②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九(人物)。按：王夫之《永历实录·丁魁楚传》称“字光三”。
-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2。
- ④《豫变纪略》卷6。并见《平寇志》卷5，光绪《永城县志》卷37、《明史》卷267《王汉传》。
- ⑤⑪《岭表纪年》卷一。
- ⑥李天根《燭火录》卷十六。
- ⑦徐薰《小腆纪传》卷六十三。
- ⑧⑨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三。
- ⑩钱秉铎《所知录》卷二永历纪年上。
- ⑫⑬⑭王夫之《永历实录》卷26《叛臣列传》。
- ⑮⑯《永历实录》卷七。
- ⑰⑱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 ⑲⑳《邑志忠义传》，《堵文忠公集·附录》。
- ㉑徐薰《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
- ㉒《永历实录》卷九。
- ㉓㉔㉕《永历实录》卷十。
- ㉖㉗《明季南略》卷十三、十四。
- ㉘张岱《石匱书后集》卷四七。
- ㉙㉚㉛《小腆纪传》卷28《瞿式耜传》。
- ㉜《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九《寄吴尔宁书》。
- ㉝㉞㉟《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一《请移蹕桂林疏》、《省会无虞再赴行在疏》、《请驻全阳疏》。
- ㊱㊲㊳㊴《瞿式耜集》卷三《戊子九月书寄》、《己丑六月初二日再付昌文》、《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
- ㊵倪在田《续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永历党祸”。
- ㊶《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

(上接第33页)

系，本文还没有对这些相关的问题作出回答。

-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8页。
- ③ 《庚子记事》，第15~16页。
- ④ 《义和团》第2册，第146页。
- ⑤ 《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946页。
- ⑥ 《义和团》，第1册，第114页。
- ⑦ 《义和团》，第1册，第271页。
- ⑧ 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第52页。
- ⑨ 《李忠节公奏议》，卷10，第4~10页。